

老知青與農村文革運動

——安徽省祁門縣大坦公社的案例(1966-1968)

● 陳意新

摘要：本文通過對安徽省祁門縣大坦公社一批文革前下鄉的知青在文革中造反活動的敘述和分析，以圖理解文革在農村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本文的研究顯示：四清工作隊對知青的指示導致了急欲投身文革的知青組織起了紅衛兵並帶動了農村的造反運動，四清工作隊對知青的信任和重用則奠定了文革中派性的基礎；明顯是基於憤恨，四清中受到傷害的基層幹部和農民成立了「貧革司」與知青為主的「紅革司」相抗衡；最終，以當地利益為核心的強勢貧革司擊潰了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弱勢紅革司，實質上拒絕了國家欲在農村打倒走資派勢力的文革政治目標。本文表明：知青在農村文革中捲入得很深；他們的造反運動是農村文革發展的一個原因，也是多種多樣農村文革的一種類型。

關鍵詞：四清運動 農村文革 知青 安徽省祁門縣 大坦公社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全國共有1,492,800名知識青年(以下簡稱「知青»)上山下鄉，絕大部分在1962至1966年間下放，其中67.3%去了農村，其餘去了國營或軍墾農場^①。城市在就業和糧食供應方面的壓力是這些青年被送走的原因，但就去了農村的知青而言，國家亦鼓勵他們用知識和才能幫助農民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基於他們所受的教育和被賦予的使命，以及他們通過閱讀新聞和維持與城市親友聯繫而獲得對時事的及時了解，人們可以預見，在1966年文革席卷全國時，這些「老知青」會帶領當地農民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成為農村文革的主力之一。

迄今為止，有限的中文著述告訴我們，老知青的造反主要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採取的行動。在《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中，定宜莊

* 筆者感謝高飛、婁彥照、劉雲、方鈞伍、胡新鑄、鈕陽、張繼生、馬稼農、許公炳對本文的幫助。高飛、鈕陽、馬稼農、張繼生閱讀了本文的初稿並提出了意見，特此致謝。

敘述了從1966年8月至1968年底持續了兩年多、在高潮中有四十多萬人返城的知青「回城鬧革命」運動。定宜莊指出：知青革命造反的終極目標是摧毀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形成的「黑暗的上山下鄉運動」，以永遠回到城市^②。這一革命顯然與農民無關。

西方學者也很早注意到知青與農村文革的關係。陳佩華等在1980年代對廣東陳村大隊的研究顯示：知青是最早的造反者。文革興起時，1964年下放至陳村的五十名廣州知青在四清工作隊扶持下率先成立了以王胖墩 (Stocky Wang) 為首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1967年春，該組織向大隊奪權失敗後，特別是大隊幹部指出王因其生父是國民黨官員而不能在政治上被信任後，王與三分之二的知青敗退廣州，在父母家消磨時光；後來王及部分同伴在1970年代初偷渡去了香港^③。依照這些學者的記述，知青對陳村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初始的影響，但他們對農村文革的作用僅止於此。

1990年代，安格 (Jonathan Unger) 總結性地把知青對他們所遭受待遇的抗議視為農村文革興起的四種「催化劑」之一 (另三種為農村中學生的騷動、城鎮動亂的波及、四清運動的餘波)。在催化劑發生作用後，農村的文革運動便主要是革命語言外衣之下傳統的宗族之間和宗族內部的權力和資源爭鬥；知青在催化了農村的文革運動後，自己通常退卻回了城市^④。

陳佩華和安格的著述對我們認識知青在農村文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亦有局限。他們的研究主要基於廣東的經驗，訪談對象主要是197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廣東知青，以及少量在1980至1990年代從廣東和其他省份去了香港和西方國家的知青。這些知青的造反與退卻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們插隊的地方距廣州這樣的城市太近，可以騎自行車返城。地理條件讓這些知青能迅速受到城市文革風潮的影響而造反，也能在文革衝突中失利時方便地退回城市；對於農村，他們則是「與農民不同姓又不願意待在那裏的外人」^⑤。

然而，在內地，大量知青融入了當地農村社會，難有其他選擇。他們插隊於遠離城市的鄉下或山區，既無便利交通條件回城，更無地理優勢偷渡到香港。他們不再具有城市身份，必須在農村生活，很多人實際上在農村裏度過了整個文革。他們在農村怎樣經歷了風暴般的文革初年？有沒有帶領農民發起造反？對農村文革有甚麼影響？或者，他們只是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回答這些問題的意義不只在於認識知青與農村文革的關係，更在於理解一個更重要的議題：文革在農村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儘管安格已對此有過論述，但中國農村千差萬別，文革衝突不能被較簡單地視為主要是地方化的宗族爭鬥，文革催化劑也並非只有四種。弗里曼 (Edward Friedman) 等人的研究顯示，在河北五公村，北京紅衛兵前去掀鬥全國農業勞動模範耿長鎖催化了一場短暫的造反^⑥；張樂天的研究也顯示，在浙江陳家場，造反派的活動與宗族沒甚麼關係^⑦。

學術界實際上對農村文革尚知之甚少。在安徽，許多農村地區的文革境況十分慘烈，大到公社，小到村莊，遠超出現有著述的描繪。1967年8月，在金寨縣古碑區 (1968年改為公社)，一個名為「五湖四海造反兵團」的組織激起了民憤，「被打死數十人」；在祁門縣平里公社紅光大隊，派性武鬥打死了4人，其中2人是

知青有沒有帶領農民發起造反？對農村文革有甚麼影響？或只是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顯然，在有知青被打死的地方，知青不只是文革催化劑，他們捲入得很深：知青的造反本身就是農村文革發展的一個原因，一種類型。

學業優秀、政治進步和理想主義的特質說明了為甚麼合肥知青下放到祁門後會身居山區卻時時關心國家大事，在聽到文革開始的消息後無比激動。家庭出身不好是這批知青的另一個特點，也是他們在1965年高考和中考落榜的原因。

知青；在黟縣西遞村的造反派武鬥中，一人被槍擊致死^⑧。這種慘烈情況當然不只發生在安徽，四川同時期也有農村地區大規模武鬥的記載^⑨。這些記錄促使我們追問：許多不諳時事的農民為甚麼要造反？那些遠鄉僻壤的村莊為甚麼會因北京的政治鬥爭而在當地進行殊死的武鬥？農民的武鬥是否也像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所研究的北京紅衛兵武鬥那樣：不是為保衛既有利益或攝取新的權利，而「只是為了不被打敗」^⑩？農村的文革在有知青的地方和沒有知青的地方究竟有哪些不同？顯然，在有知青被打死的地方，知青不只是文革催化劑，他們捲入得很深：知青的造反本身就是農村文革發展的一個原因，一種類型。

對上述所有問題的思考引發了筆者對1965年下放至皖南祁門縣大坦公社的合肥知青的興趣，而對部分大坦知青和農民的訪談使本文的寫作成為可能。這些知青在文革興起時成立了造反組織，吸引了當地部分農民和幹部。他們與省城的各種關係保持着聯繫，讓一個山區的文革有了更廣闊的坐標。他們當中有人因派性武鬥被抓到縣裏坐牢，也有人去縣城參加武鬥以混飯吃，在祁門武鬥中有着重要影響。在大坦文革結束的派性大聯合時，他們的領袖擔任了公社革委會常委乃至縣革委會副主任，顯示了知青特有的政治作用。在文革最為動蕩的1966至1968年，這些知青帶動了大坦農村的文革。由於家庭出身、個人理想、知青群體性、四清工作隊的影響、農村幹部的階級鬥爭觀、農村的宗族矛盾，以及國家的政策諸因素的交互作用，他們的革命造反既激烈又有局限，使得大坦的農村文革充滿了複雜和傷痛。

一 合肥知青

本文論述的知青是以合肥師範學院附屬實驗中學1965年應屆高中生為領袖、並包括該校及合肥五中與八中一些應屆初中生共七十二人的群體。這批人的一個特點是在校時學習成績優秀，並在政治上要求進步。1960年代，實驗中學與合肥一中同為合肥市最好的兩所中學。下鄉的高中生裏有實驗中學的成績拔尖者，例如高飛是文科尖子生，在校時就已於作文競賽中多次獲獎；而有些理科尖子生 (如陳憶雲) 於下鄉十三年後仍在1978年的高考中以全省拔尖成績考入了名牌大學。作為尖子生，這些學生不僅對人生的成就有着理想，也在政治上積極上進，有些人曾多次向學校提交過入團申請書。學業優秀、政治進步和理想主義的特質說明了為甚麼下放到祁門後他們會身居山區卻時時關心國家大事，在聽到文革開始的消息後無比激動，甚至給毛主席和黨中央發去了擁護的電報^⑪。

家庭出身不好是這批知青的另一個特點，也是他們在1965年高考和中考落榜的原因。中共政權長期對出身不好的學生懷有政治歧視，但在大學入學方面一直給他們留有一些機會。1964年，隨着四清運動在全國展開和階級鬥爭意識的強化，中共從理論上把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視為資產階級復辟的主要社會基礎之一，從此大學不再招收剝削階級的子女^⑫。這些出身不好的知青對於歧視及其後果心知肚明。在高考前，高飛乾脆向學校黨總支遞交了不參加高考

而直接上山下鄉的申請，但沒有獲批准。多年後高在自己的檔案裏看到了導致其高考落榜的批語：「該生政審不合格，不宜錄取。」^③出身帶來的政治原罪讓這些知青對文革有着保留的態度。他們渴望參加文革，又怕充滿階級鬥爭意識的革命會傷害到自己。這解釋了為甚麼大坦知青的文革活動從一開始就具有複雜性：一半的知青始終沒積極參加文革^④。



夏永陽(前)和高飛(後)在大坦村勞動時抬木頭，1966年。

如果不是參雜了兩位家庭出身好的人物並成為大坦知青的領袖，他們可能真的不會有人參加革命造反，或即便造反也只是像陳村知青那樣半途而終。就出身而言，夏永陽和鈕陽不具備革命的資格，在中共社會裏不會受到政治信任，但這兩位知青改變了大坦知青群體的政治結構。夏出身工人家庭，在校時政治風頭很健，是實驗中學的學生會主席。夏在高考落榜是由於身體原因。中國的大學自1964年以來在政審和體檢兩方面趨於嚴格，革命接班人不僅要「紅」而且須健康。夏在高考前一次手術中部分脾臟被切除，屬體能殘疾的人。鈕的家庭出身更紅，其父是革命幹部，安徽省糧食廳副廳長。鈕在校時也是政治風雲人物，曾帶頭貼出大字報批判學校是個資產階級大熔爐。但鈕曾患小兒麻痺症，腿有殘疾，也無法通過大學體檢一關。夏和鈕完全不用上山下鄉，但他們志在做個有作為的革命青年，自己選擇了下鄉^⑤。紅色出身讓夏和鈕為知青同伴自然地撐起了政治保護傘。只要他倆有一人能出來領導革命造反，大坦知青群體便在階級立場上無懈可擊，而他倆在校時就已經很願意引領政治潮流，下放後不久更迅速成為知青的領袖和官方褒獎的知青傑出代表。與此相對照，在祁門橫聯公社，十五名合肥一中高考和中考落榜的插隊知青全有出身問題，由於沒有紅色青年參雜其間，這批知青在文革來臨時只能在政治上沉默。此外，橫聯公社黨委書記對知青的熱情關懷也讓他們興不起要造走資派反的念頭^⑥。

兩個因素讓合肥知青下鄉後很快融入了大坦農村社會。其一是困難的地理交通條件，知青必須以大坦為家。另一因素是農民對知青的信任和友善。知青與許多農民之間建立起融洽的關係，一旦知青鼓動文革，也容易吸引一些農民加入造反的行列。

二 介入大坦農村社會

兩個因素讓合肥知青下鄉後很快融入了大坦農村社會。其一是困難的地理交通條件。祁門位於安徽南部邊境，其地理形勢為「九山半水半分田」，「重山疊

嶺，間道崎嶇，交通閉塞，信息遲緩」^①。縣城距合肥340公里，當時從合肥去祁門需先乘火車然後換乘汽車，要兩天時間，能否及時買到車票還是個問題。大坦距縣城還有15公里，再需步行半天以上。一旦到了大坦，知青就必須以大坦為家。

另一因素是農民對知青的信任和友善。大坦受過高中教育的農民極少，至1970年，成年人仍有41.64%不識字，41.04%只讀過初小，只有9.16%讀完高小，極少數人讀過初中^②。農民很尊重來自省城、具有很高教育程度的知青。在夏永陽小組插隊的大坦村，農民讓知青住在生產隊倉庫裏，放心把倉庫交給他們，並為他們每晚「看管倉庫」（睡覺）記上兩個工分。由於大坦比較富庶，農戶還輪流給知青小組送菜送肉。在下鄉第一年，大坦村農戶給夏永陽小組送的食物中，僅豬肉就送了有上百斤^③。農民的信任和友善讓知青與許多農民之間建立起融洽的關係，一旦知青鼓動文革，也容易吸引一些農民加入造反的行列。在大中大隊的東山下生產隊，農民方鈞伍在1967年時十六歲，與插隊知青關係好，在該年初參加了知青組織的批鬥公社黨委書記的大會。「當時是本隊知青叫我去的」，方如是回憶那場鬥爭會^④。

知青能夠介入大坦的政治生活，無疑取決於他們本身要求進步的政治態度，但在實際生活裏更與他們插隊的地點有關。1966至1967年冬春，夏永陽是大坦文革造反的領袖，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小組所插隊的大坦村是公社社部所在地。大坦村位於全社的中心，夏不僅與公社幹部熟悉，而且對公社的事件都能及時了解其動態，這自然成就了夏的插隊小組在文革中作為第一個起來向公社領導造反的知青小組。夏的小組也自然是全公社十三個知青小組的中心，各組組長定期到大坦小組集體收聽新聞和舉行交流會，而夏如果想發動全社知青的集體性行動，也可方便地通知各小組。

同樣具有意義的是，大坦村是全社最大的村莊。大坦公社1964年人口普查僅有2,688人，平均每個生產隊約23戶、85人^⑤。大坦村在1966年有60餘戶、280多人，另有一些公社及機關幹部、小學教師及其家屬等。文革的造反需要有吶喊者和旁觀者，大坦村的人口為這種活動的成就提供了可能。大坦村還是個特別容易發動「階級鬥爭」的地方：它是個傳統的聚富而居的地主村，有13戶地主富農，幾乎集中了方圓幾十里的地富^⑥。在文革一開始需要鬥爭「剝削階級」時，這些地富簡直就是為革命事先準備好了的對象。

四清運動工作隊對知青的利用，關鍵性地導致了知青介入大坦公社的政治生活。1966年8月，一支由皖南旌德縣國家幹部組成的工作隊抵達大坦，派員進駐了每個大隊和主要的生產隊，很快在貧下中農戶裏搞扎根串聯，開始整理所謂「四不清」幹部的材料。工作隊幾乎每晚要召開貧下中農協會會議至深夜，要求貧下中農揭發當地農村的幹部。由於自身人手不夠，工作隊找來了能說會寫、要求政治進步、且同為外來人的知青做助手。一時間知青成了四清運動的重要人物。在大坦村，知青不僅天天晚上為上門求助的農民社員代寫揭發材料，也常被工作隊委派去獨立主持一些鬥爭當地幹部的批鬥會，甚至還被委派在全公社的三級幹部大會現場突擊揪出一位幹部批鬥以震懾當地的幹部^⑦。工作

四清運動工作隊找來了能說會寫、要求政治進步、且同為外來人的知青做助手。工作隊的重用讓知青了解到了農村的許多「黑幕」，捲入了當地的政治生活，但也被許多基層幹部和農民視為工作隊的幫兇。

隊的重用讓知青了解到了農村的許多「黑幕」，捲入了當地的政治生活，但也被許多基層幹部和農民視為工作隊的幫兇。12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革，緊接着12月下旬工作隊突被上級召回。這一突然撤出造成的嚴重後果是讓知青成了工作隊的替罪羊，因為四清運動傷害了當地的農村幹部和一些農民，把工作隊及知青推向了這些幹部和農民的對立面。正如高飛指出^②：

這場短命的〔四清〕運動卻給我們公社留下難以彌合的群眾與群眾、群眾與幹部之間的裂痕，而且裂痕迅速擴大，以致在日後發展成自相殘殺的武鬥。工作隊點起的火、挑起的矛盾，引發的事端很多都被推到我們這些走不了、躲不開的知青身上。從此，我們被捲入了一場血與火的災難之中……

三 知青的造反和大坦文革的興起

在中共中央1966年發出了啟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後，大坦知青盼望着能夠參加文革，不過卻不了解文革有甚麼目標，不知道如何開展文革。在四清工作隊抵達前，知青參加文革的方式，基本是按公社領導要求，在全社農舍牆上用紅漆刷寫革命標語，組織文藝宣傳隊為農民表演，帶領農民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唱革命歌和學跳忠字舞等。知青通過城裏親友同學的書信知悉了一些省城乃至北京的事件，但城市的文革風暴距山村太遙遠，何況夏季裏有許多農活要忙。四清工作隊進駐後，農村文革歸工作隊領導，知青在工作隊指導和提攜下在政治上變得活躍。知青一直試圖按照新聞和黨報裏體現的中央精神以及上級領導的指示來規矩地進行文革，尤其對大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來說，規規矩矩地革命可以證明自己在政治上是在認真地要求進步。

但家庭出身帶來的政治歧視甚至讓最想規矩地革命的知青也萌發出要造反的心理，以致知青群體的造反後來能夠聚成為一股勢力。1966年8月，插隊於楓林村的知青給公社團委姜書記貼了張大字報批評其工作作風。這是全社的第一張大字報，引起了公社黨委劉書記的關注和猜疑。劉是南下幹部，文化程度低但階級鬥爭觀念很強，認為知青可能會有造反行動。因知悉一些知青可能出身不好，劉決定派公社人民武裝部方部長暗中去合肥調查全部知青的家庭出身，想以出身來拿捏住知青和掌握他們的階級鬥爭動向^③。這一調查對絕大多數知青而言是雙重的羞辱。他們已在高考和中考中因出身而落榜，如今在基層的農村社會又再次被提醒他們在政治上依然是賤民。知青日後獲悉這一調查後極為氣憤。劉雲對此記得很清楚：「劉書記調查後，我們火了，起來造他的反。我是積極份子。」後來在一次批鬥劉書記的大會上劉雲曾逼劉書記跪下^④。造反對劉雲等知青來說不只是參加文革，也是以剛性訴求找回做人的尊嚴。劉雲與夏永陽在同一個小組，他敢於如此造反當然也還因為夏是造反派的領袖，自然地撐開着紅色保護傘。

知青起來造反當然是受到了文革發展趨勢的影響。1966年10月，安徽各地大中學校聯合成立了「安徽省8.27革命造反兵團」，11月9日，省委書記李葆華代

知青在四清工作隊指導和提攜下在政治上變得活躍。知青一直試圖按照新聞和黨報裏體現的中央精神以及上級領導的指示來規矩地進行文革，證明自己在政治上是在認真地要求進步。但家庭出身帶來的政治歧視甚至讓最想規矩地革命的知青也萌發出要造反的心理。

文革為平靜的小山村增加了無謂的衝突，衝突的後果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化解，或根本無法化解。山村的農民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或劉少奇的反動路線沒有甚麼概念，但知青領導的造反卻攪起了這些底層原本不存在的政治鬥爭。

表省委就文革中壓制造反派的錯誤做了檢討，12月，造反派組織在全省各地紛紛壯大，造反的潮流從城市向農村蔓延^②。12月中旬，安徽省8.27革命造反兵團派人到祁門串聯，開展了「火燒祁門縣委」的活動，縣裏許多機關單位的領導人被戴高帽和掛黑牌遊街^③。在日益高漲的政治形勢下，大坦知青在12月裏也決定要造反，不過要規規矩矩地來。在四清工作隊指示下，大坦村的知青貼出了大字報，揭發公社的戴主任與公社醫院一位女醫生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且女醫生家庭出身不好，意謂戴受到了剝削階級的腐蝕。這是一份揭發當權派的大字報，在知青自己看來是一項重大的造反行動。當時知青尚不知劉書記已暗中調查他們的出身，不僅按工作隊的指示要在造反大潮中保住劉，並認為黨委書記就是黨的化身^④。

知青具體成立起造反組織仍是因為四清工作隊的指示。1966年12月下旬，工作隊行將撤離，鑒於尚有一些四清案子沒結清，不少「四不清」幹部尚未被處理，為保衛四清運動已取得的成果，工作隊指示知青與部分貧下中農組建一個紅衛兵革命組織。基於這一指示，在12月底工作隊撤出前夕，知青在大坦村曬穀場上宣告成立了「大坦公社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以下簡稱「紅革司」）。夏永陽擔任了紅革司的司令，大坦村貧農汪文祥擔任了副司令。公社全體知青除了一人外全部加入了紅革司，不過只有一半人為活躍成員。另一半可能因已遭受過很多歧視而害怕政治運動，寧可遠離政治以柔性防衛來保護自己免受傷害；他們掛名為紅革司成員更主要是為了顯示合肥知青的集體性和團結^⑤。

紅革司的成立讓大坦公社的文革進入了短暫的造反時代。到了1967年1月，文革的目標在全國都已變得很清楚：打倒劉少奇及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各地的代理人。安徽造反派在1月份三次召開了批鬥李葆華及其他省領導人的大會。隨着批判劉少奇及李葆華的造反活動從上到下地展開，安徽各級黨委領導都毫無例外地被視為走資派。在大坦，紅革司也自然地將黨委劉書記作為主要的鬥爭對象。此時，劉派人外調知青檔案之事已被知曉，很多知青也特別想批鬥劉。農民方鈞伍清楚地感覺到：「當時文革開始，知青是主人。」方加入了紅革司，他還記得在當時^⑥：

我們白天、甚至半夜都鬥劉書記。當時在大坦鬥劉，鬥過後把他戴上高帽，與原來的〔祁山〕區委書記一塊戴高帽子，到縣裏遊街。上半夜抓到劉書記，半夜到縣裏遊街。頭子是合肥知青夏永陽。

紅革司帶動了大坦農民在1967年1至2月間的造反行為。例如在大中大隊，農民開會批鬥了所謂的「當權派」、大隊會計胡旭出。胡出身中農，會打算盤，從1950年代起就是大隊會計，批鬥會當然要胡交代他有沒有貪污的問題。在只有十二戶的東山下生產隊，農民批鬥了一次生產隊的當權派、會計廖立民，給廖戴了高帽，要他交代有沒有多吃多佔的問題。農民還開會批鬥了五十多歲的貧農廖季喜。他在文革前從外村遷至東山下村，平日常吹噓當年紅軍路過他的家鄉時，他向國民黨報過信。由於他實在說不清楚自己的報信究竟是怎麼回

事，東山下的農民開會鬥過他好幾次，紅革司也把他抓去公社鬥過一次。在村裏和公社被批鬥時，他都挨過打，但人們始終也沒弄清楚他是否真的給國民黨報過信^⑳。

文革為平靜的小山村增加了無謂的衝突，衝突的後果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化解，或根本無法化解。這些山村的農民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或劉少奇的反動路線沒有甚麼概念，但知青領導的造反卻攪起了這些底層原本不存在的政治鬥爭。正如在東山下村生活了一輩子的知青婁彥照後來指出：「我們不來，農村的造反造不起來。」^㉑

四 造反的知青與大坦文革的衝突

知青的造反不幸地為自己在大坦樹立了強有力的政治敵人。在紅革司造公社劉書記的反時，知青在批鬥會上不僅給劉戴了高帽，還用墨汁畫在了他臉上醜化他，亦有知青或農民在會上動手打了他。按劉雲等知青的說法，劉書記不是甚麼壞人，只是心眼小，「他把仇恨都記在了夏永陽頭上。」^㉒知青已經貼過大字報揭發戴主任，如今又批鬥了劉書記，結果是把公社最重要的兩個幹部和他們的追隨者都推向了對立面。

很快知青的紅革司就不得不面對更為強大的本地造反組織：「貧下中農革命造反司令部」（以下簡稱「貧革司」）。大約在1967年2月中，大坦的基層幹部及部分農民成立了這一組織，主管政法工作的公社陳副主任擔任了司令。從成立起，貧革司就聲稱要保劉書記。在知青的認知裏，劉書記等一些公社幹部是該組織的後台，是其「影子內閣」，貧革司成立的實際目的就是為了與紅革司對着幹。貧革司人多勢眾，並因擁有槍支而實力強大。皖南因聲稱有過國民黨空投特務而允許山區農村的民兵擁有少量的槍支彈藥，大坦公社被允許擁有相當於一個排力量的武裝民兵，而掌握武裝民兵的各大隊民兵營長都站在了貧革司一邊^㉓。

於是1967年2至3月間，大坦出現了兩個對立的造反派組織，演繹着奇怪的造反邏輯。兩個組織為了表現自己更為革命，搶着鬥爭光華大隊的一個地主，結果在鬥爭中對該地主拳腳相加，以致其被亂拳打死^㉔。但就各自的造反傾向來說，紅革司要造劉少奇資產階級路線的反，要鬥其當地的代理人走資派劉書記；不過鑒於很多知青希望能在黨的指引下進行革命，紅革司卻又不肯鬥爭縣委。當時祁門縣城有許多其他公社的知青駐扎在那裏參加向縣委奪權的造反活動，受縣知青辦一位官員的請求，紅革司知青在2月的某天組織了小分隊連夜步行去縣裏動員其他公社知青回鄉。大坦知青到了縣城後與其他知青進行了辯論，要堅持上山下鄉正確方向和維護縣委的正確路線，結果被其他知青斥為「受蒙蔽的保皇派」^㉕。在另一方，貧革司也聲稱要造資產階級路線的反，卻要保劉書記，結果貧革司造反的主要傾向不是打倒本地的走資派而是清算四清運動。貧革司的主要成員在四清中幾乎全是被鬥爭對象，對四清有憤懣，而打倒劉少奇的四清工作隊、清算四清運動的錯誤就是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

貧革司以農村的基層幹部為核心，公社幹部隱身其後。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在四清中受到了傷害，並受到很多農民的支持。紅革司的核心是知青，也得到了當地部分幹部和農民的支持。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有文化或有過城鎮生活的經歷，認同知青對文革的理解和行動。

從組織上看，兩派的形成還是有迹可尋的。貧革司以農村的基層幹部為核心，公社幹部隱身其後。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在四清中受到了傷害，加上長期互相認識或互為親戚，因此在人情、傳統、利益的基礎上組織了起來，並受到很多農民的支持。他們想清算四清運動，對知青的不滿當然與知青在四清中的表現有關。紅革司的核心是知青，也得到了當地部分幹部和農民的支持。例如紅革司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公社貧協主任廖小引、輝煌大隊高中畢業的回鄉知青林子伯、住在小嶺村的獸醫陳松吳。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有文化或有過城鎮生活的經歷，在農村一直感到受排擠或未能發揮所長，認同知青對文革的理解和行動。紅革司支持者中的普通農民則通常與一些知青接近和關係良好，受到知青的影響而加入了紅革司^③。

兩派的出現使中央發動的文革運動在大坦趨向於地方化。如前所述，安格指出農村的文革在初期被催化後會轉化為宗族衝突。在大坦，宗族矛盾也體現在文革的派性中。例如在沒有知青插隊的光華大隊，農民主要為汪姓和鄭姓，兩姓一直有矛盾。鄭姓是弱勢宗族，在紅革司成立後加入了該組織，追隨了知青；汪姓是大姓，勢力強，加入了貧革司^④。東山下村曾當過多年生產隊長和大隊幹部的胡新鑄認為：「文革這裏搞得厲害，是地方派系在鬥，主要是個人成見。」^⑤所謂地方派系和個人成見，指的就是地方宗族間的爭鬥。不過在大坦，宗族矛盾從沒有安格所研究的廣東農村那麼厲害，只是日常生活中相互間感覺不好和不願來往而已。派性中含有宗族矛盾，使得文革的政治衝突具有了地方性色彩，但在大坦它沒有轉化為宗族鬥爭，因為知青是紅革司的領袖和中堅。

仔細審視，貧革司是一個完全以本地人組織起來、以維護本地政治利益為核心的強勢同盟，紅革司則是一個以外地人和部分本地人結合、以意識形態為其中心政治的弱勢同盟。知青的造反在開始時受到了文革形勢和四清工作隊的影響，其初始的目標不是要向本地的公社或大隊領導奪權；參加紅革司的農民也顯然不認為自己能夠通過紅革司而掌握地方權力，他們更多地是認同紅革司的政治理念和行為。紅革司沒有形成一個地方性利益集團。

在造反高潮時，各種變動暫時性地朝着有利於紅革司的方向發展，並讓紅革司在兩派爭鬥中一度佔了上風，這也讓貧革司和許多農民感到知青威脅了當地的利益。在1967年2月至3月初，紅革司和貧革司大體安於文鬥，有過一些不分勝負的辯論。但知青更了解文革的形勢，並有外力的強援。2月，合肥實驗中學的「8.27文藝宣傳隊」到祁門宣傳表演，並受紅革司邀請於2月10日（年初二）在大坦村曬穀場上向全公社演出。在這支體現了省城造反潮流和造反派力量的宣傳隊演出後，紅革司的影響在短時間內達到了頂點。但大坦農民卻為表演中殺氣騰騰的造反歌舞感到震驚，以致高飛感覺到「一向溫良恭儉讓的山民們感到天下大亂，對知青的看法一下子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⑥。農民感到知青似乎會使用暴力在山區進行革命造反，威懾當地的反對力量，改變農民的傳統生活。雖然紅革司盛極一時，但這種反感卻讓許多農民和新成立起來的貧革司與知青的矛盾難以緩和。

貧革司是一個以本地人組織起來、以維護本地政治利益為核心的強勢同盟，紅革司則是一個以外地人和部分本地人結合、以意識形態為其中心政治的弱勢同盟。貧革司和許多農民感到知青威脅了當地的利益，兩派的對立情緒最終釀成了暴力衝突並導致知青在政治上失利。

兩派的對立情緒最終釀成了暴力衝突並導致知青在政治上失利。1967年3月2日，縣裏的造反派奪取了縣委權力後正式分裂為兩派：「祁門縣革命造反派聯絡站」（以下簡稱「聯站」）和「祁門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指揮部」（以下簡稱「聯總」）。聯站認為公安局包庇了掌權的聯總，於3月4日在縣公安局門口靜坐示威，駐縣許多知青造反派參加了這一行動^②。紅革司的知青雖未參加靜坐，卻作為聯站的同情者去縣裏圍觀了包圍公安局的行動。當晚回到大坦村時，興奮的知青把社部貧革司的牌子砸了^③。這一行為在第二天激起了貧革司的憤怒，兩派辯論了整整一天。第三天，駐紮縣城的蚌埠知青「回馬槍戰鬥隊」聞訊趕來支援，與貧革司發生了武鬥，並俘虜了幾名貧革司農民。第四天當回馬槍戰鬥隊將俘虜押解到縣城時，正值祁門縣人民武裝部奉命對公安局、郵電局、廣播站實行軍管，一支部隊的首長看到了蚌埠知青強力押解貧革司農民進城，很是不滿，於是「知青打人」便立即在祁門被傳播成為了大眾所知的事實。祁門縣軍事管制委員會很快宣布了駐縣知青三大造反組織「紅色造反團」、「回馬槍戰鬥隊」、「合屯（合肥—屯溪知青）司令部」為非法，並立即將其領袖逮捕。3月18日，縣公安局又派員到大坦逮捕了夏永陽，顯然認為紅革司領袖是祁門「知青打人」事件的始作俑者。貧革司雖在武鬥中失敗，卻從受害者的角度獲得了政治鬥爭的勝利。然後他們在大坦的鬥爭中佔了上風，開始打壓知青，甚至要把一些女知青單獨分配到不同生產隊去被監督勞動^④。

政治失利未讓知青屈服，也沒有終結大坦的派性鬥爭。紅革司知青認為自己忠心向黨、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錯，也絕不屈服。後來他們狡黠地利用上山下鄉運動的正當性替換了派性政治，把自己定義為地方黑暗政治下的知青受害者。夏永陽被捕後，紅革司中的活躍者立即開展了以營救夏為中心的活動。有幾位知青留在縣城探監送飯，向縣軍管會申訴；另一部分回到了合肥，一方面在省城的中心地帶貼出大字報控訴大坦公社及祁門縣走資派對合肥知青的迫害，另一方面則通過渠道向一些省領導人申述祁門「知青打人」事件的真相，希望他們施以援手。雖然此時省裏領導人已大都為造反派所罷免，無法起到公開的作用，但他們還是批了條子，希望祁門縣有關部門了解「夏永陽是個好同志」^⑤。在省城及安徽造反派群體裏，祁門的知青事件一度廣為人知，大坦劉書記也成了劉少奇黑線上迫害知青的代表人物。雖然沒有證據可以說省領導的批示對祁門縣軍管會和公安局起到了作用，但兩個月後夏永陽被釋放。由於在監獄裏受過暴力虐待，夏回合肥養傷。知青在派性政治中失利，卻又因上山下鄉運動的正當性重新站穩腳跟，沒有被擊敗。

政治失利未讓知青屈服，也沒有終結大坦的派性鬥爭。紅革司知青認為自己忠心向黨、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錯，也絕不屈服。後來他們利用上山下鄉運動的正當性替換了派性政治，把自己定義為地方黑暗政治下的知青受害者。

五 知青的潰敗與大坦文革造反時代的終結

政治激情是大坦知青參與文革造反和派性鬥爭的根本動力，在派性政治失利後仍然沒有消褪。1967年夏天，在夏永陽被釋放後，紅革司的主要成員回到合肥，他們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高認識，重新集結；另一方面，貧革司在

派性爭鬥最終導致了紅革司知青的潰敗。滿是身心創傷的大坦知青在家鄉已難以覓得可以傾聽他們控訴的領導、對他們報同情心的市民、對他們關懷的同學。家鄉的變化要求知青為自己重新定位：自己到底還是合肥人或已是祁門人？自己的未來在哪裏？

大坦掌權，他們也有些擔心大坦會再次陷入武鬥。大部分知青則留在農村過着日常生活。此時祁門縣城裏聯站與聯總兩大派爭鬥愈演愈烈，全省各地城市都處於狂熱的派性武鬥中，人們為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流血犧牲。這種鬥爭鼓舞着紅革司主要成員的政治激情，激勵他們投身到文革的鬥爭中去。高飛當時認為自己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即便被打死也在所不惜」。只不過在吸取了夏永陽事件的教訓後，紅革司知青更希望以文鬥的形式在大坦進行文革，以免因武鬥而再度失利^{④⑥}。

農村的生活現實也推動着一些知青積極參加文革運動和派性鬥爭。據婁彥照回憶，下放在大坦最遠一個山村的一位知青就有實際的生活問題，而這一問題讓他成為大坦知青在文革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插隊在一個距社部8公里的深山小村，後5公里全是山路，人迹罕至。他的村莊缺糧，主要靠春汛時伐木放木的收入購買全年的糧食掙回村裏。住在無路、單調和缺糧的山中，生活太閉塞，以致他在造反和派性爭鬥的日子裏基本上住在大坦村鬧革命，即便回了深山也是一感到有風吹草動了就跑出來。又如，另一位知青實際是個上海人，先到合肥投奔親戚，因找不着工作又跟着合肥知青下放到了大坦。他抽煙喝酒，農村生活對他來說太過艱苦。他先是參加了紅革司的活動，到了1967年8月縣裏兩派開始武鬥後，他乾脆去了縣城，為混飯吃而為其中一派做武鬥專業人員^{④⑦}。

派性爭鬥最終導致了紅革司知青的潰敗。1967年12月8日，祁門縣兩大派進行大武鬥，動用了槍支，死傷十餘人^{④⑧}。紅革司的主要成員在11月裏已回到了大坦，以刻印和散發傳單的文鬥方式堅持自己的文革活動，沒去縣城參加大武鬥。貧革司的民兵卻因縣人民武裝部的相召而參加了，並放言在武鬥後將回到大坦「收拾知青」。鑒於這一威脅，紅革司主要成員近二十名男女知青在縣城大武鬥前幾天撤出大坦村，去了鈕陽小組的楓林村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求在



部分紅革司知青在1967年12月敗退合肥後在合肥的留影。第二排右二為夏永陽，第一排左二為高飛，右一為鈕陽，右三為鈕陽的弟弟。當時因其父被批鬥而去祁門投奔其兄，也與其兄及紅革司知青一起敗退合肥。

公社中心之外躲開險惡的時刻^④。但貧革司從一開始就知曉知青的躲藏地點，在縣城武鬥結束的當晚連夜返回大坦，帶着幾十支步槍和兩支衝鋒槍襲擊躲在楓林的知青。在連夜追擊逃向深山塢的知青時，貧革司的一位大隊民兵營長看見遠處有手電光，認為是知青而開槍射擊，第二天天亮卻發現誤殺了楓林大隊一位生產隊隊長胡兆貴^⑤。12月9日下午，知青在攀登一個山坡時被貧革司追上，在民兵密集的射擊中，手無寸鐵的知青只得投降。鈕陽和高飛差點當場被槍決：鈕因為率領知青逃跑而惹怒了貧革司的民兵，高則因為貧革司想找一個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來承擔胡兆貴被打死的責任。槍決兩人的決定都因貧革司中一位對國家知青政策有點知識的公社幹部阻止而沒有執行。但在被押回到大坦村的公社禮堂後，十一名男知青全遭到了毒打。在關押了四天後，知青乘看守的民兵回家烤火取暖時出逃，為躲避貧革司的追擊而繞道杭州和上海回合肥。近二十人沒有錢，帶着傷，靠着拜求各地的收容站及扒乘火車的方式在12月19日回到了合肥^⑥。

然而，省城的形勢已經改變。省裏的老幹部都已被打倒，不再是可以指望的依靠；造反也不再是潮流。外省進駐的軍隊對安徽實施了軍管，強力制止了各地的武鬥，並強迫造反派領袖隔離辦學習班，對武鬥的重要份子進行了懲處^⑦。母校也不再是落難知青可以回歸的懷抱。實驗中學的老師都已因各種各樣的問題被打倒，學生中的造反派頭頭都進了學習班，外地的同學大都已回家，合肥市的同學大多已對造反和武鬥感到厭倦，開始沉迷於戀愛或文體娛樂活動。滿是身心創傷的大坦知青在家鄉已難以覓得可以傾聽他們控訴的領導、對他們報同情心的市民、對他們關懷的同學。家鄉的變化要求知青為自己重新定位：自己到底還是合肥人或已是祁門人？自己的未來在哪裏？

大坦亦和幾個月前的情況不一樣。沒有了知青造反的喧囂，山村生活回歸了平靜。紅革司依然存在，但不過是個名字而已；貧革司不再有重大的活動。劉書記重新在大坦的文革領導小組掌權，戴主任失去了職務但卻被委派主管生產^⑧。農民也需要開始整理農具、農田和製茶設備，另外要挖冬筍、做米酒、製新衣等為過農曆新年作準備。留在農村的知青大多與當地村民和睦相處。他們雖為紅革司成員，但沒有參加紅革司的激烈活動，即便貧革司的農民也大多和他們相處得安好^⑨。

最終，國家的政策讓看似無望的紅革司知青重獲生機。早在1967年7月9日，中共中央在應對老知青回城鬧革命風潮時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的社論。除了要求知青回農村和農場去之外，也對地方上的走資派幹部發出了警告：「他們對起來造他們反的知識青年，進行了種種政治迫害，特別惡毒的是挑撥知識青年與貧下中農的關係……煽動大批上山下鄉知青離開生產崗位，擁〔湧〕向城市。」^⑩這社論幾乎是為大坦知青量身而作。儘管1967年各地因政局混亂而沒能執行知青返農的政策，但在1968年1月底農曆新年一過後各地就開始強力返歸知青，並將不願回農村和農場去的人定為「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階級敵人、壞份子」^⑪。紅革司知青本來就沒想要賴在城市，《人民日報》社論和城市的知青返農政策正好讓他們有了挺胸回農村的正當性和安全感。1968年4至5月間，知青被毒打的傷痛已養好，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已成立，各地

國家的政策讓看似無望的紅革司知青重獲生機。《人民日報》社論除了要求知青回農村和農場去之外，也對地方上的走資派幹部發出了警告。紅革司知青本來就沒想要賴在城市，《人民日報》社論和城市的知青返農政策正好讓他們有了挺胸回農村的正當性和安全感。

知青的回村終結了大坦的文革衝突。當知青不再是激進的造反者，大坦的幹部和農民亦不再與其鬥爭。衝突的終結卻也是知青轉型的開始。由於出身好，夏永陽和鈕陽的轉型是從知青轉成國家幹部。對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來說，轉型是從知青轉為農民。

都在重建秩序。在收到祁門來信報告大坦要搞大聯合和籌建革委會後，紅革司知青決定返回農村。

知青的回村終結了大坦的文革衝突。造反的時代已經過去，當知青不再是激進的造反者，大坦的幹部和農民亦不再與其鬥爭。1968年夏，劉雲代表了大中大隊的紅革司與貧革司的代表簽了字，實施了兩派的大聯合^⑤。由於大坦村隸屬於大中大隊，這一大聯合意味着在大坦公社的中心，文革的造反和派性鬥爭都告終結。無論大坦的幹部或農民喜歡與否，知青是挾着國家上山下鄉的政策回來的，夏永陽一直是省級知青的傑出代表。因此在10至11月間大坦公社革委會成立時，夏被吸納進了革委會當了常委。劉書記是革委會主任，一度的仇敵如今又一起共事^⑥。

衝突的終結卻也是知青轉型的開始。對夏永陽和鈕陽來說，由於出身好，他們的前途比較清晰。夏在1970年被吸納進了祁門縣革委會當副主任，1973年擔任了燈塔公社黨委書記，1975年被調回合肥提拔成了省知青辦副主任，後來在改革年代擔任了省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局長。鈕在1970年招工回了合肥，以後提幹做了安徽拖拉機廠的黨委副書記。夏和鈕的轉型是從知青轉成國家幹部。對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來說，轉型是從知青轉為農民。1968年12月，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啟動，大坦的大多數老知青從這場運動中再也看不到回城的希望。他們年齡已增長，同一小組的男女同學在共同生活了三四年後有了感情，有些知青與其他小組的知青或與當地農民有了感情，有些乾脆只是想有個家。因此到了1969年，當造反和武鬥不再佔據人們的精力時，插隊小組紛紛解散，很多知青開始結婚成家，向個體家庭轉變，真正扎根當了農民。他們還需再等十年，直到中國進入後毛澤東時代才有機會憑本事以考大學、考教師職位等方式回到城市；一部分人則一直留在了祁門山區^⑦。

六 結論

大坦的文革無疑為中國農村文革的一種類型：以知青為主角的農村文革。與廣東陳村知青不一樣，大坦知青不僅是農村文革的催化劑，而且還是主要力量。政治激情和地理環境是他們堅守在農村進行文革的重要因素。他們渴望通過政治表現來證明自己，而地理及交通條件讓他們無法輕易離開農村。他們以自己的政治覺悟和四清工作隊的支持成為農村裏最初的造反者；他們的行動帶動了農民的造反，導致了農村文革中的派性和衝突。這一類型也在祁門另外一些公社發生。1965年平里公社安置了合肥知青133人，1967年8月其紅光大隊在派性武鬥中打死4人，其中2人為知青^⑧。這些數字讓我們能夠合理推斷：知青在平里公社也是文革的催化劑和主力，他們在那裏引起了甚至比在大坦更為激烈的政治衝突。前引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更展示出這一類型也在全國其他農村發生：「他們〔地方走資派幹部〕對起來造他們反的知識青年，進行了種種政治迫害……」儘管這些農村的知青和文革的故事還沒有得到研究。

四清運動所挑起的矛盾是農村文革派性衝突的一個重要根源，在大坦，它更是決定性的根源。四清對農村幹部搞普遍清查，讓許多人因小事或小錯而受到批鬥、免職或蒙冤。這一短命的運動在農村中造成了一批憤懣的幹部和農民，在農村社會裏播下了仇恨的種子。安格曾指出，在那些沒有知青的農村或者知青沒有扮演要角的農村，憤懣的四清下台幹部在文革中常抓住造反的機會試圖奪回他們失去的職務，四清上台幹部則同樣堅定地要保住他們剛獲得的權力；派性以這兩批人作為分野⁶⁰。但在大坦，派性明顯地是四清運動造成的後果，而不是以下台幹部和上台幹部作為分野。知青由於曾作為四清工作隊的幫手而成了四清受害幹部報復的目標；貧革司的組成明顯地針對知青為主的紅革司，是基於憤恨的情緒而非基於文革的理念。從更長的歷史看，中共在農村的重大運動一直都在農村社會裏人為地製造着深遠的矛盾，例如強制性的土地集體化、罔顧現實的大躍進。所有這些深遠的矛盾都會成為文革中派性衝突的根源，只不過四清挑起的矛盾因其與農村文革銜接而成了派性衝突的直接根源。

大坦的文革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場國家權力和地方勢力的博弈。這場文革呈現出了地方化趨勢，但卻沒有完全轉變為革命外衣之下的地方宗族鬥爭。知青的特殊性決定了大坦文革的性質：他們是剛融入農村的外來人，與農村社會積年的矛盾沒有淵源；他們不是為自己在當地攝取權力或利益而開展文革運動，而主要是按意識形態和上級的指示造反和進行文革，因此是國家政治目標的代言人。但他們的造反威脅到了地方領袖的權力和利益，導致了地方勢力結成聯盟，進而擊潰知青，實質上拒絕了國家欲打倒農村走資派的文革政治目標。在這場國家與地方的博弈中誰也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地方勢力是被動的防禦者，只能倚仗地方的傳統文化、人脈網絡、利益關係來保護自己。但國家權力無論有多麼集權，也沒有強大到足以摧毀各地的地方勢力。這些因素決定了大坦知青在面對地方強勢聯盟時注定會失敗，但卻又能挾着國家政策的威力歸來。在沒有知青的地方，可能如安格所說，農村文革的鬥爭本質上是地方化了的衝突，建基於長遠的社會矛盾之上。

大坦的文革具有災難的結果和影響。貧革司的農民被毆打過；紅革司的知青被毒打過；一個地主以革命的名義活活被打死；一個生產隊長因武鬥的混亂被槍殺，開槍的民兵營長後來又被判刑十年⁶¹。生產隊會計廖立民、貧農廖季喜，以及更多的農民在被批鬥後怨恨多年難以化解，讓山區的村莊難以回歸到往昔的和睦。公社劉書記更是放不下被批鬥的羞辱和憤懣。在1970年代後期清查文革中提拔的「火箭式」幹部時，已離開大坦的劉書記不斷向省裏有關部門寫信，控告夏永陽批鬥他，在他臉上畫墨汁羞辱他，非人道地逼迫他喝煤油。其實大坦的知青都知道，在初下鄉時劉書記對夏特別好，認為夏是革命事業的真正接班人。文革毀掉了劉和夏的親密關係。雖然夏批鬥過劉，但畫墨汁不是夏做的；喝煤油可能是子虛烏有，這事因夏已病故無法再求證。但劉把所有仇恨記在了夏的頭上，這一仇恨在劉於1990年代去世時依然未能釋懷⁶²。大坦文革最終留下的影響是長遠的怨恨與傷痛，其他有過文革衝突的農村其實也是一樣，正像在浙江陳家場，一對叔姪因文革「結下的怨仇延續至今」⁶³。

大坦文革是一場國家權力和地方勢力的博弈。知青是國家政治目標的代言人。但他們的造反威脅到了地方領袖的權力和利益，導致了地方勢力結成聯盟，進而擊潰知青，實質上拒絕了國家欲打倒農村走資派的文革政治目標。在這場博弈中誰也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

註釋

- ① 潘鳴嘯(Michel Bonnin)著，張清津譯：〈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載金大陸、金光耀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中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頁399-423。
- ②⑬⑭⑮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391-93、405；287；406；411。
- ③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04-26, 149-50, 182, 210.
- ④⑤⑥ Jonathan Unger,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th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3 (March 1998): 82-106.
- ⑥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92-105.
- ⑦⑧ 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206-13；209。
- ⑨ 安徽省金寨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金寨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29；祁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祁門縣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頁30；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黟縣志》(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9。
- ⑩ 四川省《武勝縣志》編纂委員會：《武勝縣志》(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頁40。
- ⑪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0.
- ⑫ 高飛：〈蹉跎與奮進——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一至四)，《江淮文史》，2003年第1期，頁25-43；第2期，頁28-48；第3期，頁27-49；第4期，頁35-61。
- ⑬ 高飛(合肥知青)訪談，2012年12月18日。
- ⑭⑯⑰⑱⑲⑳㉑㉒ 婁彥照(合肥知青)訪談，2000年7月12日。
- ⑳ 高飛訪談；鈕陽(合肥知青)訪談，2012年12月18日。
- ㉑ 郭嘉驊：〈上山下鄉13年〉，柴春澤國際聯盟網，www.chaichunze.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200；許公炳(合肥知青)訪談，2012年12月16日。
- ㉒⑳⑳㉔ 《祁門縣志》，頁1-5；29；30；30。
- ㉕⑳ 祁門縣革命委員會生產指揮組：《祁門縣國民經濟歷年統計資料：1949-1972》(1973)，頁9；8、15。
- ㉖⑳⑳⑳⑳㉔㉕ 劉雲(合肥知青)訪談，2000年7月14日。
- ㉖⑳⑳ 方鈞伍(大坦農民)訪談，2000年7月13日。
- ㉗⑳⑳⑳⑳⑳⑳⑳ 高飛：〈蹉跎與奮進〉(二)，《江淮文史》，2003年第2期，頁35-36；37；38；39；39；40；41；42-48。
- ㉘⑳⑳⑳⑳⑳⑳ 馬稼農(合肥知青)訪談，2012年12月24日。
- ㉙⑳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歷史大事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頁218-21；227-81。
- ㉚ 劉雲訪談、馬稼農訪談。
- ㉛ 胡新鑄(大坦農民)訪談，2000年7月12日。
- ㉜ 鈕陽訪談。
- ㉝ 高飛：〈蹉跎與奮進〉(三)、(四)，《江淮文史》，2003年第3期，頁30-32、第4期，頁55-61。
- ㉞ 馬稼農訪談；張繼生(合肥知青)訪談，2012年12月18日。